

前言

我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校园内度过的。1997年，初次来美国的第一站是在纽约州的一所大学的全球事务研究所作短期学术访问。一年后受邀请去了芝加哥的一所州立大学社会学系作访问，并参与进行有关全球化的课题。此后，获准攻读博士学位。2005年完成博士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与此同时，获聘到了美国南方德州的一所公立大学任教。回头看，这二十年时间，几乎都是在校园内度过，也亲身感受到了西方文化在大学校园生活以及制度建设方面的特点。

然而，我也曾有近二十年在国内的校园生活。早在1971年，我在上海繁华街区的一所中学读书。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学生们成了红卫兵，资深的老教师则成了批斗对象。校园生活充满了文攻武卫的气氛。1975年毕业时正值上山下乡的高潮，作为当时的学生干部，我积极报名去了当时在安徽省的一所茶林场，在那里从事基层连队工作6年有余。全国高考恢复后，我于1981年考上了当年在全国唯一具有社会学专业的上海的一所地方高校就读。1985年毕业后分配到了南方沿海的一所著名大学，直到1997年出国。因此，前后相加，包括在中学期间那几年共有20年时间的校园生活。由于青春时期是人生的重要阶段，因此，这二十年时间的校园生活，基本上奠定了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然而，当时并未感觉到东方文化在校园生活和制度方面的显著性以及和西方文化对比的差异性。

在西方校园生活的二十年与在东方校园生活的二十年作了对比之后，才使我感受到其中的差异，以及文化基因对于制度建设的重要意义。有关对西方文化的讨论泛见在各种书刊中。然而，以“文化基因”作为切入点，把校园生活和制度建设作为研究角度和视野的文章似乎不太多。

正如人们所知，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两大文化发展模

式：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而这两种文化的根本差异体现在哲学意义上则是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体系。个人主义的思想体系与西方文化相伴而生，集体主义则与东方文化紧密结合。比如，在中国，从封建社会的群体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都强调社会、国家、集体的利益；社会本位价值观是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而西方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个人主义，它强调的是个人本位以及与生俱来的权利与自由。

正如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彼得·伯杰(Peter L. Berger)在《资本主义革命》一书中所说，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基因是欧美现代化市场经济形成的一个先决条件。西方传统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基因，最初经过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的洗礼表达为个性解放、个人自主和个人自由的文化理念；紧接着这些文化理念为人际间达成契约关系提供了条件。由于契约关系明确界定了个人的权利与义务，这就又向制度化的现代市场经济秩序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从这个视角来看，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文化基因，尤其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得以弘扬的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的文化理念，是西方近现代社会最终形成一种制度化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内在力量。

同样，在社会主义文化基因里，集体主义无疑是社会主义文化基因的内核，它尽可能地在其社会成员中传播和复制。它更多地强调个人服从集体，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而在集体中则强调尊卑有序，级第分明的“差序格局”。同时，集体主义文化基因要监视、识别、批判各种非社会主义的文化理念，抗御和限制它们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思想体系的危害。它要对西方所标榜的“人权”、“自由”等所谓的“普世价值”保持警惕和批驳；它要抵制以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文化观，应对和驳斥各种非难、攻击、颠覆社会主义思想的错误观念。

可见，市场经济产生于个人主义社会文化之中，带有明显的个人主义文化基因。然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之后，要把西方的市场经济移植到社会主义体制之中，这不仅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创造，也显然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社会转基因”工程。这项“社会转基因”工程首先要对市

市场经济体制进行资本主义的“体制外切割”，然后和社会主义的文化基因实现拼接重组，最后形成既带有西方市场竞争优势，又兼具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最终把它导入社会主义体制中，实现与社会主义的完美结合，展现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无古人的历史篇章，可见这一工程之复杂和艰巨。而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之后，重新回顾这一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如此之多难以克服的障碍，以及如此艰难曲折的经历，其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的转型并未与文化相配套；而文化又受制于其组成的“基因”内核。

制度与文化相辅相成。光有制度，没有文化，则制度难以贯彻。制度必须辅以文化才能彰显其良好功能与效应。文化基因与制度效应又互为因果。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改变一个社会的面貌并不只是改变其法律、制度，而是要改变其整体的社会文化，以及承载这一文化的众多个体即普通大众的素质，并引导大众积极参与和实践。而完成这一“社会转基因”工程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时间跨度和他们的共同努力。

“制度”又是文明的“标尺”。或者说，“制度”作为文化概念的子集，它是标尺性维度，是标定文化是否文明的“技术指标”。制度是“实体”，文化则是“灵魂”。当制度被确立之后，文化才能被彰显。于是，制度问题其实都是文化问题。文化的独特性，决定了制度的独特性。于是，所谓探究“制度的特色”实质上是在窥视“文化的特征”。

本书取名“制度的文化基因”意在强调文化基因对于制度设计和建设的重要性。虽然各篇的关注焦点在于校园的各个场景，其现实意义远在校园之外。无疑，当代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等无不存在于各种制度之中，然而其制度恰恰是由它“文化基因”所决定的。文明社会必将由更为理性的制度设计所塑造和推动，而其根本的前提和诉求也在于“文化基因”的转变。

孙嘉明 写于橡树庄

2020年6月